

德胜寺残碑校释

Col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Incomplete Stele at the Desheng Monastery

王 浩

Wang Hao

内容提要：

德胜寺是明代镇边城辖区内的一座寺院，其遗址保存至今。遗址内残存有明代嘉靖年间重修寺庙的碑记碎块，共三块。残存碑文较完整地记录了京师西北部镇边路的长城防御体系及其主要职官信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中期、特别是庚戌之变后京师西北部长城防御体系的完善和加强。本文通过对碑文的校释，结合文献等资料对明代、特别是嘉靖时期镇边路长城及所属四座城堡的形成做一梳理，揭示了镇边路长城防御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

关键词：

明代 长城 德胜寺 镇边城

ABSTRACT:

The Desheng Monastery was a Ming dynasty monastery located 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town of Zhenbian (lit. guarding the frontier). The site houses three fragments of a stele that marked the renovation of the monastery during the Jiajing reign. Inscriptions carved on the stones are fairly thorough in addressing the defensive system at Zhenbian Great Wall northwest of the capital and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major officials governing the fortress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mid-Ming dynasty massive building at the Great Wall to the northwest of the capital especially after the Gengxu incident (in 1550 when Altan Khan attacked and plundered for two weeks) enhanced and perfect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imperial system. By col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stele inscriptions, and studying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paper sorts out fac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Zhenbian Section of the Great Wall and its four forts during the Jiajing reign and the Ming dynasty at large, and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strengthening the defences.

KEYWORDS:

Ming dynasty, the Great Wall, Desheng Monastery, the town of Zhenbian

德胜寺遗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雁翅镇大村西五里的山腰上，南为湫河沟峡谷，遗址附近有大村至马套一带的北齐长城遗迹，自古便是重要的军事隘口和通道。遗址坐北朝南，山门坐西朝东。现仅存殿宇房屋的基址，其中钟楼保存较好，尚存木构及卷棚顶。《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称德胜寺遗址“仅存明嘉靖碑一通，已碎为三段”。笔者考察遗址时，找到这三段残碑石，连同碑首的上半部碑身残块，残宽 60 厘米、高 20 厘米，碑首半圆形，线刻卷云纹，碑额双钩阴刻楷书“重修碑记”四个字，背面刻“万古流芳”；最大的一块残碑石是碑的下半部分，高 91.5 厘米，右侧保存较多，左侧仅保留有 4 厘米高的边框。由此可知，碑身整体的宽度是 89 厘米，碑身周边饰草叶纹；还有一块比较小，呈尖三角形，高 56 厘米，宽 25 厘米。此残碑正反两面均有碑文，背面碑文是各方捐资信众的名字，正面碑文记述了寺庙的历史以及重修庙宇的过程等，重要的是它较完整地记录了京师西北部镇边路长城防御体系的主要职官名称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中期、特别是庚戌之变后京师西北部长城防御体系的完善和加强。

历史文献中关于德胜寺的记载不多而且很简略，《光绪昌平州志》中有一条记述：“德胜寺在州治西南镇边城德胜泉上，盖唐寺也”，直接说明了德胜寺的位置和年代。对德胜寺及周边环境较为详细的记述也出现在《光绪昌平州志》中：“（长峪城）又西五里有崖曰德胜，又曰凤凰。上有兰若，山下出泉，流二十里达于浑河。山上有隐鹭台，山西有观音洞，又曰孤松崖。山南岭曰西峪。其下有碑，不可辨识”²，碑文中亦有“有山名为凤凰，此山水势源源……”等语，文献与碑文相互映照。文献中的“上有兰若”当指德胜寺而言，《光绪昌平州志》认为德胜寺的始建年代可能是唐代。碑文中也有“肇自前朝，历世颇长”等语，这里的“前朝”是指元朝还是泛指明以前的朝代，碑文并未明确指出，但从这点碑文可以明确的是德胜寺在明代嘉靖年间重修时已没有证据能表明寺院的历史了。碑文中“考于胜国至顺二年维时本寺住持讳如琦也……”也仅可说明德胜寺在元代至顺二年（1331 年）已经存在。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等人在调查北京早期长城遗迹时对德胜寺遗址也进行了考古调查，并提出了“从遗址中残存的条纹砖看，寺庙的始建年代可以上溯到辽金时期”³的观点。

1 镇边路所辖长城最初名为“横岭区”，“隆庆三年总督侍郎曹邦辅改区为路。”《四镇三关志》卷六，第 205 页。

2 缪荃孙、刘万源等：《光绪昌平州志》，第 173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 年。

3 唐晓峰、陈品祥主编：《北京北部山区古长城遗址地理踏查报告》，第 16 页，学苑出版社，2009 年。



图 1 镇边路四城及德胜寺位置示意图



图 2 德胜寺遗址全景



图3 德胜寺残碑拓片(未按比例)

从北京地区佛教的发展阶段以及同地域相关寺院的始建年代分析,德胜寺的始建年代也极有可能是辽金时期。但同时也不能排除始建年代更早的可能,因为德胜寺处于南北交通和军事孔道上,附近的北齐长城遗迹也说明此地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而辽金时期条纹砖等文物的出现也有可能是重修寺院的遗存。

一 碑文核定及考释

依据对残碑文字的缀合及对残碑形状的比对,笔者认为三块残碑石中最大的一块和最小的一块可拼合,而与碑首之间存在缺失,现校录如下:

都督同知陝右神木龍山張堅舉□□□□時升任遺下書丹尚未建□□升新□」張欽建立」
 后有山名为凤凰此山下水势源源前山状如伟□左右山水龙虎相伏盖□□协如」
 所掌印千兵也来诣予陈其事以碑记嘱予持报□□□张公丹予悉□□□□□□」
 考于胜国至顺二年维时本寺住持讳如琦也逮□□」
 一焕然其堂宇足以事神其形势足以快物诚是方人神之□□□也□□久则敝至」
 越丙辰岁乃都督张公历其所乐其寺之形势□其寺之倾圮□□□□□□□□□」
 树楹以计其永剔蠹镂新以易其观土木伟而备景物□□□□□□□□□」
 依人人承神人神一道也古传今今继古古今一理□□德□□□山□之□□人□」之主堪世守□山水既高□□□□主持□□□也始以」
 龍山張□知以人奉神之責而用是為守茲寺者□」

词□」

肇自前朝 历世颇长 姑识重修」

人神共安 以嗣以续 翊运无疆」

镇边城」

中军见任□」把总见任□」标下千户□百户李茂 前任百户张国用」署印千户□见任百户金鳌」

前任参府□」见任参府□」管工委官□」

横岭城守备□百户麻世隆□」

白羊城守备□赐张应乾□」

长峪城把总□」

时

皇明天王嘉靖三十□」

德胜寺残碑文字中的所记职官是比较完整的横岭路主要职官体系。从横岭路参将到长峪城把总全部体现在碑刻中。其中职衔较大的两位主要人物，也是重修德胜寺的主导者是张坚和张钦。结合碑记和史籍，两人在德胜寺重修的一段时间内的任职情况大致如下。

张坚，碑文载是陕西神木人，查《神木县志》：“张坚，累官都督同知，充大同总兵官挂镇西将军印，名重三朝，诰封四世。”据县志记载张坚及其子孙至少四代为武将，可谓武将世家¹。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实录》第一次出现张坚的名字，时任固原守备，同其他一些武官一起得到兵部尚书的举荐，得以调赴“总督军门立功”²，二十三年时已任大同游击将军了，到嘉靖二十四年正月，以署都指挥僉事升任左参将分守大同南路应州等处³。张坚很可能是德胜寺嘉靖年间重修的倡导者，他的来京与任职是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以及之后一段时间的军事建设紧密相关的。在攻入京畿的蒙古俺答部兵刚刚撤出之际，明廷就痛定思痛般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边防，其中就有“选将”一项。嘉靖二十九年九月己亥，“召……参将刘环、赵卿、张坚……各赴京听用，以兵部荐也”⁴。嘉靖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之间的张坚大至也应在大同、宣府任职，明实录嘉靖三十一年四月乙卯仇鸾在关于出击情况的回复中提到：“惟俟游击张坚兵至，分道出塞，用收犁庭功以慰圣念也”⁵，说明此时张坚仍在此地域任职，但职务已降为游击将军。《宣府镇志》卷二十七载嘉靖三十二年张坚以都指挥僉事任分守宣府南路参将，他的任职不超过一年⁶。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壬辰，张坚在宣府南路参将任上被升为署都督僉事充总兵官镇守大同⁷，仅月余，十一月癸亥兵科都给事中王国祯等就参劾“贪婪暴戾之张坚”，在兵部的说明下得旨调用。但王国祯再次上疏“言张坚原无威望以千金贿升，此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1 “张坚，累官都督同知充大同总兵官挂镇西将军印，名重三朝，诰封四世。张刚，即坚之子也，任固原总兵官。请纓壮志，裹革精忠。登坛富黄石之谋，解纆高赤松之节。山之隐豹、国之飞熊，议祀乡贤。张斌，刚之子，原任高家营参将。忠孝性成，谋勇天授；弱冠早膺简命，壮心直扫犁庭；家业增光，疆场倚重。张拱微，斌之子，任三屯营副将。善骑射，臂力过人，抚士卒有恩，日推牛粪土曰：‘朝廷有难，朝闻命吾夕行矣！’顾是时，阉寺监军而文臣从中指授方略，武臣唯诺而已。拱微闻檄，即日环甲兼程，而前生所蓄貲分给将士，临战身先士卒，冲锋撼坚敌，遇之辟易，战既夕，解鞍少息，而张拱微啣臂大呼曰：‘众勿前！’丈大一取大蠹（蠹），驰马陷阵，杀数十人，矢尽弦绝而死”。《神木县志》，第169页，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台湾），1970年。

2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辛巳）上曰虜患未靖，用人当取所长……兵部尚书张瓌复荐……固原守备张坚……等皆忠勇可使，诏俱赴总督军门立功”。《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五，第5253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3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乙巳）命大同游击将军署都指挥僉事张坚充左参将分守大同南路应州等处”。《明世宗实录》卷二九四，第5628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嘉靖二十四年四月戊申）兵部复工科给事中何云为勘上二十三年十月宣府失事功罪……千户郭唐等六十一人及参将张坚等四十九人量罚……郭唐等各夺俸半年”。《明世宗实录》卷二九八，第568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4 《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五，第6525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5 《明世宗实录》卷三三四，第6782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6 《宣府镇志》，第327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

7 《明世宗实录》卷四〇三，第7053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终于使张坚“格任闲住”¹。他在大同总兵官任上仅一个多月时间,《神木县志》说他挂镇西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大同当指此事。客观地说,张坚从分守参将直升总兵官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现象,一般都要经过副总兵协守一镇的经历,而且还是边防地位十分重要的大同镇,这次的升迁确有蹊跷之处。张坚经过这一次的挫折,“闲住”了近一年,到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己巳“命镇边城右参将王臣充总兵官镇守居庸、昌平,以原任大同总兵张坚充右参将代之”²,这说明张坚在嘉靖三十三年十月以参将职衔分守横岭路,成为横岭路建置以来的第二任参将,也说明明廷虽然在嘉靖三十二年停任了张坚大同总兵官,但并没有撤销这一升职。到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己亥,以秋防功劳“镇边城参将张坚升都督同知荫一子百户”³,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嘉靖三十二年张坚任参将时是都指挥僉事,正三品;升任大同总兵官时是署都督僉事,都督僉事是正二品;到嘉靖三十三年横岭路参将任上,升为都督同知,从一品。德胜寺残碑所记张坚职衔正与文献相合,碑文又有“时升任遗下书丹”语,说明张坚在升任都督同知后,职务也有所变化,不再担任横岭路参将。而重修碑记的建立者张钦,是横岭路参将张坚的继任者。明实录嘉靖三十七年七月癸丑有一条以宣府游击张钦、大同游击周邦分守古北口潮河的记载,如果这位张钦与一年后的横岭路参将张钦是一个人的话,那么张钦继任横岭路参将的时间不会早于嘉靖三十七年。现有材料能明确的是张钦在嘉靖三十八年任横岭路参将,而碑文中又有“越丙辰岁(嘉靖三十五年)”的话,结合碑文落款“嘉靖三十”分析,德胜寺在嘉靖年间的重修当在嘉靖三十五年至三十九年之间,尤以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最为可能。

横岭路参将嘉靖三十二年设置后,一直驻扎镇边城,直到嘉靖四十五年。镇边城也是镇边城守御千户所的所在地,横岭路军事、军政管理体系的衙署、官僚驻扎在镇边城的较多。碑文中出现的职官除了上述参将级别的二人外,主要还有“中军”、“标下千总”和“署印千户”等。“中军”和“标下千总”职官的出现,说明了此时横岭路守军中出现了标兵。标兵是明代总督、巡抚以及总兵亲统之兵,是明代中后期军队中的一支精锐力量。中军的主要职能是传达军令等,而标下千总则是统御标兵的武官了。肖立军先生所著《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一书中认为昌平总兵标兵建立时间为嘉靖四十二年⁴,同书在讨论标兵建立时间时,认为标兵的设立必有“统领标兵的将校,或游击,或坐营中军官,或千、把总,起码三者必居其一”。依据这种观点,德胜寺碑中同时出现了“中军”和“标下千总”,就可以认定标兵的存在了,因昌平镇三十九年才设置镇守总兵,而薊辽总督标兵、薊镇巡抚标兵设置都在嘉靖三十八年前后,因此,德胜寺碑所载标兵职官具体属于哪支标兵尚无法确定,抑或隶属于入卫的他镇标兵。

明代守边官兵参与修庙的记录不胜枚举,仅以德胜寺周边寺庙现存碑刻资料看,有镇边城辖地内的大悲岩观音寺,该寺在镇边城辖下竖子口山顶上,有一块崇祯十四年“重建大悲岩观音寺碑”,碑文记载了僧人在镇边路四城官兵的支持下完成了重修庙宇的工作,大悲岩由于在山顶上,修建工作十分艰难,碑文中也有“磨石白羊,越千岭而度百涧,工费至此,寸石寸金”之语,这当中军人当出役不少。又如与镇边路辖长城

1 “(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癸亥)兵科都给事中王国祜等言薊保为京师肘腋,而宣大则其项背……往者大同总兵吴瑛再失事薄罚之已失刑矣,乃复代以贪婪暴戾之张坚,是贖迁……”《明世宗实录》卷四〇四,第7069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2 《明世宗实录》卷四一五,第7211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3 《明世宗实录》卷四二八,第7399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4 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第3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

相连的保定镇马水路沿河城辖下小龙门口附近有“重修小龙门观音堂碑”¹，此碑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立，立碑人是沿河城守备刘景寿，同碑还有守口将佐25人的题名。军人热衷于修庙的活动与当时的社会信仰有关，也与军人的职业性质有关。在修庙过程中军人出资出力，不仅民间有修庙的事积极参与，形成“军民共建”，更主动组织修庙活动，德胜寺即为一例，残碑正面文字除碑记外，有近一半的空间全部是守边将士的题名，可见军人在德胜寺重修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结合碑文和当地民间流传的说法，德胜寺在明代到嘉靖时期至少应修缮过两次。第一次应在明初，而第二次就是碑刻所记的嘉靖年间的维修。碑文虽然残缺，但仔细阅读之后，再比照碑文格式，仍可发现其实碑文记述了两次对寺院的修缮，第一次是“焕然其堂宇足以事神其形势足以快物”，第二次是“树榼以计其永剔蠹镂新以易其观土木伟而备景物”。这两段话中第一段与“考于胜国至顺二年维时本寺住持讳如琦也……”相邻较近，第二段话与“越丙辰岁乃都督张公历其所乐其寺之形势口其寺之倾圮”相邻较近，虽中间均有断缺文字，但总体看应是相连的关系。而两次维修在规模上也不相同，第一次仅是“焕然”，达到“足以事神”的程度，第二次则精致到“剔蠹镂新”的程度，修缮效果也是“土木伟而备景物”了。《北京门头沟村落文化志》一书中记述了一段民间流传的关于德胜寺由来的文字：“据说大明初期，西口子住了土匪，他们打家劫舍、骚扰百姓。百姓联名上告，于是京城发兵剿匪。行至长峪沟，山前原有一小庙，众将官在庙前行礼许愿，若能顺利剿灭匪徒、捣毁匪巢，待凯旋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官兵进发西口子势如破竹，顺利地平定了匪患，归来后便重修了这座庙宇，名曰‘得胜寺’”。这段口碑资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明以前此地已有寺庙建筑，只是到明初时已衰败，这正好印证了碑文所记至顺二年关于本寺的记载。另一个是说明了在明初有过一次以军人为主导的修庙过程，如笔者对碑文理解不误的话，亦可印证碑文所记明初第一次对寺庙的维修。德胜寺在嘉靖年间修缮之后的发展轨迹，因没有文献和碑刻记载目前已不可考。询之当地村民，说是1949年前后还有少量僧人活动。就目前遗址保存状况分析，寺庙活动应至少延续到了清末民国时期。

二 镇边路四座城堡的建置

残碑碑文中出现了四座城堡，即白羊城、镇边城、横岭城和长峪城。四城中以白羊口建置最早，元代既设白羊口千户所，隶属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²。元代已是居庸关以西重要的关隘。明初洪武年间，北平都司奏请“宜以各卫校卒戍守其地”的两百处关口中就有白羊口。景泰元年（1450年），广宁伯刘安奏调涿鹿中千户所官军一千余员名在已有旧城的基础上筑白羊口堡³。“上跨南北两山，下当两山之冲，城高二丈五尺，厚一丈二尺，周围七百六十一丈五尺，东西城门楼二座，东月城门一空，敌楼四座，水旱门五空，城铺一十五间，护城墩一十二座”。横岭城建置其次，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建立北城一道，正德八年（1513年）添修南城一道，共为堡城一座，“东西跨山，南北当两山之冲，长五百二十丈，铁门三座，水门二空，敌楼二座，闸楼一间，吊桥一座，护城墩二座”。镇边城和长峪城均为正德十五年建。镇边城“东西跨山，高厚

1 国家文物局主编：《北京市文物地图集》下册，第264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2 《元史》卷八六，中华书局，1976年。

3 《西关志》，第18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不等，而下据两山之冲。堡城高一丈八尺，周围六百八十一丈，城门楼二座，角楼二座，水门二空，城铺一十三间。”长峪城“东西跨山，其城上盘两山下据两山之冲为，堡城高一丈八尺，周围三百五十四丈，城门三座，水门二空，敌台二座，角楼一座，城铺十间”。四座城堡中，镇边城和长峪城后来又都建有新城。

四城的建置与明朝和蒙古的战争紧密相连。最初四城中白羊口地位突出，在史籍中常常是与紫荆关、倒马关等并提，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后的十月“命塞居庸关以西一带山口，以杜达贼往来”，景泰元年正月乙未武清侯石亨建议紫荆关、白羊口等处累遣人守砌，砌塞山口¹，很快在正月甲辰“已遣官军砌塞”，到了三月丙午，守备白羊口都督同知刘安等奏报“白羊等三十六山口修筑俱完”，紧接着景泰元年五月就设置了相应的白羊口守御千户所，发给了銃炮等战具，至此，白羊口的守备力量在此前旧城的基础上大大改善了。白羊口新城也正是此时建立的。白羊口所扼守的白羊沟是与八达岭关沟平行的一条重要进京路线，因此也是防守压力比较大的重要地区。白羊口不仅迫近京师，而且距陵寝更近，明廷对这里的防御格外重视，在土木之变之后到景泰六年之间朝廷是派监察御史提督守备白羊口的²。鉴于白羊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一旦失守即无险可守的境地，明廷大臣在蒙古的军事压力下很快认识到“白羊所守在内，其外口空旷”的现实，于是“西循白羊口后，逾岭四十五里得见横岭口地方，直通怀来，山坡平漫，系贼来路，当就横岭中间筑堡城一座，草盖营房，陆续拨隆庆卫所军人七十名在彼守把”。起初，横岭口只有北墙一道，横岭口的修建当与弘治十七年七月大理寺少卿吴一贯经略边关有关。过了八年时间，同样是因为蒙古兵打到了繁峙、灵丘等地，朝廷命京营官军分守居庸诸口，横岭城的南城墙应于此时修建，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城堡。横岭城堡分两次修筑完成的事实说明明朝君臣虽然认识到了白羊口孤弱的事实，但重视程度仍不够，横岭城守军寡弱且由于“地势高阜，难于得水，守军散住于村落（加注西98）”。所以此时的守备重点仍在白羊口堡，如正德九年七月“虏营近边，连亘不退，且窥伺居庸……巡关御史朱昂亦请防守白羊口。兵部议：……以都督佥事张椿统之，守白羊口。”到了正德十一年“虏寇白羊口等处”，并引起了恐慌³，横岭一线仍复失事⁴。正是这次正德十一年战事失利，缘起了镇边、长峪二城的建置。正德十四年四月，皇帝认为居庸关东西二路墩堡空缺，传旨要求兵部赶紧商议可以增修筑的地方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差都御史李瓚经略东西关隘，添筑墩堡。李瓚深以横岭“最为要害，虏骑易乘，又相度本岭东二十五里筑长峪城，南去二十里筑镇边城，以辅横岭把截”⁵。两城修筑完成在正德十六年，五月时两城“工讫改名，灰岭口曰镇边城，上长峪口曰长峪城”而这个时候正德皇帝已薨，因此，两城的修建是在正德皇帝在位时，而二城的最终定名则是在嘉靖皇帝即位以后了。至此，四城的建筑全部完成，居庸关西南，京师西北部的防御形态基本成形。针对这四城之间的统属关系和职官设置，在明代几经变化，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边防形势以及明廷对这一地区防务认识上的变化。

关于白羊口守备的设置时间，《西关志》《四镇三关志》《重修居庸关志》等史籍记载为弘治十八年设，

1 赵其昌主编：《明实录北京史料》（二），第22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

2 “征提督白羊等口御史董廷圭、周清还京。初，以达贼犯边，诸口添御史提督修守。……以边报稍宁……乞征廷圭等还京。故有是命。”赵其昌主编：《明实录北京史料》（二），第30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

3 “时边报亟甚，所在惊溃。诸谒陵者还自昌平，或传虏已入白羊口，皆策马而走，老幼扶携相属于道。”赵其昌主编：《明实录北京史料》（三），第10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

4 《西关志》，第18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

5 《西关志》，第18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

有的还用“添设”一词，实际上至迟在景泰元年设置白羊口守御千户所时就已经有白羊口守备了¹，弘治十八年随着横岭口北城墙的修建等一系列工程的完善，在白羊口城设置了正式的守备公署，白羊口守备负责管辖横岭等口。横岭城修建后，设守口千户，到正德十一年议增兵横岭、上长峪二口，设指挥一员，驻扎横岭，总管二口，原守口千户如故，听白羊口守备官约束²。正德十六年随着镇边城和长峪城的建成，嘉靖初年在长峪城建了提调公署，嘉靖二年正月御史李俨请募兵三百人，守居庸关长峪城，同年添设把总指挥一员。镇边城修建规模较大，较之长峪城大了近一倍，横岭城是两次增建，白羊城是在旧有基础上增建，唯独镇边城是新设城堡中规模最大的，说明筹划者在建造之初就赋予了该城堡重要的功能。正德十六年镇边城刚一建成，立刻设立了镇边城守御千户所，隶隆庆卫。正德十六年五月初七日钦奉明旨，白羊口守备移驻镇边城，兼制横岭。在镇边城还设有仓等设施，这一切说明此时四城的指挥重心从白羊口移到了镇边城，白羊口改设把总驻防。整个防线向西北方向推进了，改变了以往只守内口的局面，将防御重点推到了镇边城、横岭城一线紧邻怀来盆地的山上。嘉靖四年，仍复白羊守备，镇边城始添设把总。嘉靖四年的退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桂荣在嘉靖二十一年上疏认为是“镇边守备规避多端，反弃要害不守，退入白羊住坐”，就生活角度来说，白羊城在四城中当属最为便利，紧邻平原地区，离京师也近，而镇边城、横岭城一带不但“总括达贼来路”，危险性高，而且山高苦寒，交通不便，对于将领的生活是不便的。嘉靖二十六年横岭城添设把总³，在此之前它仍是管总官的地位，在四城中地位最低。嘉靖二十八年改横岭把总为守备，“分以白羊戍卒百人，以塞怀来之路”⁴。这样在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前，四城就形成了两守备两把总的态势，统属于居庸关分守参将，此外，在白羊城还有游击将军一员。



图4 白羊城



图5 长峪城



图6 镇边城辖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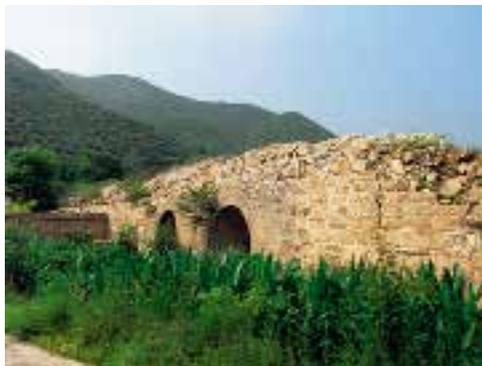


图7 横岭城

1 “(景泰元年六月壬辰)虏寇七骑散入棒槌峪，白羊口守备都指挥金事段升以闻。”赵其昌主编：《明实录北京史料》(二)，第23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

2 《西关志》，第9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

3 《西关志》，第18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

4 赵其昌主编：《明实录北京史料》(三)，第38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



图8 大村村委会所藏天启五年铁钟



图9 大村村委会所藏天启五年铁钟铭文局部

庚戌之变后，这一地区的军事建设与职官配置有了大的变化，首先是在嘉靖三十年分居庸为居庸、黄花二区，嘉靖三十二年又增横岭区，至此原居庸关辖区分成了三区，这三区的格局终明之世再未有大的变化，这也是后来的昌镇所辖长城防区。在横岭区设立的同时，设置了横岭路参将，并于横岭城修盖了分守参将公署，但到嘉靖四十五年之前，分守参将都住在镇边城。嘉靖四十五年，分守参将驻横岭城，原横岭守备改驻镇边城，原镇边城把总被裁革，长峪城把总则改为提调。经过了庚戌之变的明朝政府不仅提高了横岭路四城的防守级别，而且参将设置后都在镇边城、横岭城驻扎，防御重点和指挥中心不再犹豫地放在了镇边城、横岭城一线，白羊城的防御压力大大减轻，地位也有所下降。庚戌之变后，随着宣大二镇防御的加强以及明蒙关系的变化，镇边路在嘉靖朝之后防御压力相对减轻，设置也基本稳定。今德胜寺南大村村委会院内有一口明代天启五年的铁钟，由钟铭可知，此时镇边路参将又复移驻镇边城，横岭城为守备。到了明末崇祯年间，长峪城的级别有所上升，依据长峪城原天仙庙所遗明代崇祯十五年铁钟铭文看，此时长峪城亦设守备，这一变化可能与明末农民军的活动地域日近京师有关。德胜寺残碑体现的横岭路四城的守备军官体系正好反映的是嘉靖三十二年至嘉靖四十五年之间的情况，即横岭路参将驻镇边城，横岭城守备、白羊城守备、长峪城把总的时期。

三 余 论

德胜寺明代嘉靖年间的这块重修碑记虽然破碎严重，但是它所记载的长城防务建置以及职官资料对于研究明代长城仍不失为重要的材料，而碑文中表露出来的释道混杂的词句以及特殊的落款格式更值得思考。德胜寺残碑在落款处有一比较特殊的文字，就是“皇明天王嘉靖”中的“天王”一词，它夹在国号“皇明”和年号“嘉靖”之间，格式罕见！德胜寺不是显赫的敕建寺庙，但也不是纯民间性质的庙宇，重修碑记的建立者均为朝廷武官，在文字上绝不会任意为之，即使是民间修庙，词句语言方面可能会有不周之处，也绝不会在国号和年号日次重要的地方胡乱添加，所以此处的“天王”一词应有特殊的含义。在传统观念里，天王也泛指封建帝王。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奉天殿（现太和殿）等建筑失火，嘉靖皇帝在八月殿宇还未复建时就酝酿更改殿名，他就此事询问大臣，大学士严嵩在

回答为什么取名奉天时说“臣闻传记有曰：天子至尊无上，又曰人君其尊如天，此系先儒之言，而其原出于孔子作《春秋》系王于天，称天子曰天王。此孔子言，后世莫有易之者……”¹道藏中《太清玉册》也说“受天命而君天下者曰天王”²，依此说，此处的天王可理解为天子。即使这种解释成立，在碑文格式上仍显另类。在佛教中天王也称神王，佛教护法神。古印度神话中称须弥山腹有四天王，佛教采用其说，在四天王中，毗沙门天王（即北方多闻天王）在中国最为推崇，特别是自唐玄宗以后，对毗沙门天王信仰大盛，常被军中奉为保护神，各处城楼、兵营均设天王庙堂，甚至于常以天王像文身，视为可得神力相助³。此碑中的“天王”一词是否还隐含关于德胜寺性质的其他信息或是守边军人的特殊信仰，还需要继续探讨。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科研处]

(责任编辑：赵中男)

1 《明世宗实录》卷四五〇，第7642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2 中国道教协会、苏州道教协会编：《道教大辞典》，第182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

3 孙红梅、邓学青：《唐代天王俑艺术形象赏析》，《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